從自利到利他

重現臺灣忘失已久的社會關懷力

鄧煌發 博士

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（所）專任教授

楔子

當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，幾乎無一國家倖免，讓人過著惶惶不安日子的窘境下，我們身懷犯罪矯正專業的社群人士，到底能夠做到其他人所無法，或難以達成的任務？

大多數人是幸運的，沒有遭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；同樣地，更有絕大多數的人尤為幸運，沒有經歷過犯罪訴訟、審判、監禁的洗禮。巧合的是，無論染病或犯罪而身陷囹圄，同樣有著類似的經驗：自由頓失，懷著罪惡感面對外界的責難，若可感知可描述的意象，就如同外在世界似乎一直重複地往自己的身軀，內縮、內縮、再內縮……留下很孤獨、很無援的自己，僅只期盼有人願意伸出雙臂拉拔、接納、包容……

人性本惡下的社會控制

自1980年起，我的學術研究、實務工作一直都跟犯罪預防有關，迄今已歷40年。其間，對非行少年、犯罪人、被害人、犯罪事件等問題，從懵懂無知到有些心得；從學生、警察、矯正官、警官等實務到從事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學術研究，無論從犯罪人（criminal）抑或從被害人（victim），乃至從情境（situation）切入；換句話說，無論從發展犯罪學（developmental criminology

）抑或從被害者學（victimology），乃至環境犯罪學（environmental

criminology）切入整個犯罪事件的分析與處理，大致認為：人是趨樂避苦的理性動物，不顧是否損壞他人利益，往往為了一己之私，在行為初發當下，並無有效壓抑他行動的大好時機下，進而做出害人利己之事；在此思維邏輯下，無論是針對犯罪外在客觀行為而出的古典學派（classical school），或以犯罪人內在主觀條件而發的實證學派（positive school），都把犯罪的一切惡質歸諸於社會化不完善的人，尤其沈淪在社會底層的邊緣人，因此社會必須建構一個安全防衛網，把這些社會化不完善的邊緣人隔絕在正常社會之外，讓他們飽嚐自作自受的滋味，以滿足絕大多數人未如他們的拙劣的高慢感覺。

因此，犯罪總源自於人類自私自利（self-interested）傾向；當一個人認為所花費成本低而其代價獲利高的可能時，他於焉選擇犯罪。當前世界各國社會對於這群非我族類、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們極度強調妥善的控制，以及增強他們對謀算長遠利益的訓練，以防止他們以犯罪手段侵犯到大多數人的利益。此時的社會責任，即建立於被覆著馴服隱藏於人類內心的自私自利與粗暴本性（ selfish and brutish nature）的文化目標之上，針對「難於矯正」之犯罪人，或具有嚴重犯罪性之偏差行為的反制措施，並將這些犯罪人或危險犯排除於正常社會之外的方式。以刑事司法之具有懲罰性(punitive)、隔離性(isolative)、閉鎖性(closed)的機構性之矯正處遇措施為主，強調長期刑、定期刑，以及剝奪人身自由之選擇性監禁等嚴刑峻罰之監獄；甚至主張恢復死刑，以擴張死刑之威嚇性效果。

另一方面，為期有效掌控導致犯罪或偏差行為之所有可能因素，對具危險性者施以先發式（preemptive）措施，對犯罪人施以反應式（reactive）措施； 這些措施包括資料庫（data banks）、CPTED（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）、CCTV（閉路監視系統）、電子監控、秘密機構（ secret agents）、線民（informers），以及以臥底(undercover)方式為誘捕技巧(decoys)等措施，期能有效監控社會不安份子，藉嚴密控制以達到社會治安的目標。

當西方罪感文化侵襲東方恥感文化

當中華文化精髓：內修、禮治、羞恥感、重視家族血脈的教化價值觀，與西方文明核心：外塑、法治、罪惡感、重視自我權益的普世價值觀相遇時，竟然沒料到會演變成「邪勝正」、「惡屈善」的惡果相狀；尤其臺灣一味傚學美國的犯罪學理論（以社會控制為最）、正式刑事司法控制作為（美國是世界監禁率最高的國家），造成臺灣社會提供價值觀渾沌不明、衝突對立、怨恨分 化、敵意等的兒少成長環境……

如何而能讓臺灣免於淪為犯罪率極度高張、監禁率居世界之冠的當前美國窘境？以40年學習、探究犯罪預防的經驗，個人發現我們犯罪問題的核心，並非如社會控制論者所言，人是自私自利的性惡說，人之所以淪入犯罪淵藪，主要是他嚴重地缺乏社會支持（social support）與社會關懷（social concern）的必然結果！

卸下為高再犯率負責的黑鍋

如同警察被迫背負著犯罪率高升的黑鍋般，只要更生人再犯罪，批判矯正機構教化效果的社會輿論如排山倒海而來。而一般人總是慣用「再犯率」(Recidivism rate)代表犯罪矯正的教化效果：高再犯率就代表犯罪矯正教化無功

，社會各方無情的苛責從行政院、法務部、矯正署層層而下，著實讓各級犯罪矯正機關承受莫大的壓力，而「欲言又止」式的解釋，更加重公務員卸責之

「莫須有」罪名。

犯罪學領域的相關研究指出，一時非自願式的禁錮，將促使個案更生復歸效果不升反降；而更生人之是否回歸家庭？是否就學、就業？其過往惡習是否依然？……等等，才是決定其再犯與否的主因。除了社會大眾並不瞭解真實面相外，毫不假思索地隨著媒體「人云亦云」，畢竟責備少數人總比絕大多數人

容易。

表1 近10年新入監受刑人前科概況一覽表

|  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年 | 新入監人數 | 無前科 | 有前科 | 再犯 | 累犯 |
| 人數 | **%** | 人數 | **%** | 人數 | **%** | 人數 | **%** |
| 2008 | 39,647 | 12,441 | 31.38 | 27,206 | 68.62 | 8,890 | 32.68 | 18,316 | 67.32 |
| 2009 | 34,668 | 10,653 | 30.73 | 24,015 | 69.27 | 7,579 | 31.56 | 16,436 | 68.44 |
| 2010 | 29,567 | 8,390 | 28.38 | 21,177 | 71.62 | 6,746 | 31.86 | 14,431 | 68.14 |
| 2011 | 28,723 | 7,563 | 26.33 | 21,160 | 73.67 | 7,158 | 33.83 | 14,002 | 66.17 |
| 2012 | 27,185 | 6,337 | 23.31 | 20,848 | 76.69 | 7,518 | 36.06 | 13,330 | 63.94 |
| 2013 | 26,552 | 5,747 | 21.64 | 20,805 | 78.36 | 7,442 | 35.77 | 13,363 | 64.23 |
| 2014 | 27,773 | 5,530 | 19.91 | 22,243 | 80.09 | 7,796 | 35.05 | 14,447 | 64.95 |
| 2015 | 27,504 | 5,087 | 18.50 | 22,417 | 81.50 | 7,528 | 33.58 | 14,889 | 66.42 |
| 2016 | 28,417 | 5,069 | 17.84 | 23,348 | 82.16 | 7,254 | 31.07 | 16,094 | 68.93 |
| 2017 | 29,612 | 5,053 | 17.06 | 24,559 | 82.94 | 7,419 | 30.21 | 17,140 | 69.79 |
| 平均 | 29,965 | 7,187 | 23.51 | 22,778 | 76.49 | 7,533 | 33.17 | 15,245 | 66.83 |

資料來源：作者依法務部(2019)資料繪製

如表1所示，臺灣地區各監獄新入監人數，從2008年的39,647人(最多)逐年減少至2013年的26,552人(最少)，近3年則呈現增加趨勢；綜觀近10年來每年平均約有29,965人新入監服刑。在這些新入監受刑人之有前科的人數，從2008年的最多(27,206人)逐年減少至2013年的20,805人，然後再逐年增加至2017年的24,559人，人數增長趨勢大致與整體新入監人數相似，且這10年中每年平均約有22,778位前科犯再度入監服刑。相對地，無前科的新入監受刑人數，則從2008年的12,441人逐年減少至2017年的5,053人，且近10年平均約有7,187位新入監服刑者為無前科者。

再從有前科的新入監服刑人數再分成再犯、累犯來看，近10年臺灣地區新入監服刑受刑人中，再犯人數以2008年最多(8,890人)，而以2010年的6,746人最少，平均每年約有7,533人屬於再犯。再從出獄5年內再犯罪之累犯人數觀之， 從2008年的18,316人(最多)，逐年減少至2012年的13,330人(最少)，然後再逐年緩增至2017年的17,140人(次多)，每年平均約有累犯15,245人入監服刑。



資料來源：作者依表1繪製

圖1 近10年新入監受刑人前科、累犯比例發展趨勢圖

進而挑出比例重者之有前科與累犯之相對比例的發展趨勢，如圖1所示。顯而易見者，在所有新入監之受刑人中，有前科者之比例從2008年的68.62%， 逐年攀升至2017年的82.94%，顯見臺灣地區近10年新入監之受刑人多為有前科者，無前科者之比例逐年減少至近4年的2成弱；若加入線性之發展趨勢圖，可見其上揚角度極大，有前科者呈現明顯上升趨勢。而在所有有前科者之受刑人中，相較於再犯，惡性較重之累犯比例發展趨勢，呈現出緩升再降，然後在2012年之谷底，再逐年緩升之2017年之最高點(69.79%)，整體呈現波浪之趨勢

；若加上線性發展趨勢，則有不明顯、極微幅之上揚趨勢。

歸納台灣地區近10(2008-2017)年矯正機構新入監受刑人人數趨勢，先呈大幅下降而後緩升之趨勢，其中，有前科者是無前科者之3.17倍，其相對之比例約為8:2，且有前科者呈現逐年上升趨勢。又在有前科者之中，累犯又是再犯的2.02倍，其相對於再犯之比例約為7:3，且累犯呈現緩降再略升的趨勢，惟上揚幅度極微。

從以上官方統計資料分析，足見台灣地區實質的犯罪，大多是由有前科者、累再犯所犯下者。對此現象，一般人除認為他們被關押，是「應該

的！」、「活該被關」等再次苛責受刑人外，接著即轉而責備犯罪矯正機構之教化無功，如此之譴責該當嗎？其實際情況又該如何？

正向犯罪學：送給社會每個份子的禮物

人類進入21世紀的首旬年，西方資深且極富盛名的學者Cullen與Agnew分別在2008、2013年提出了符合我們中華文化精髓的整合型理論：社會支持理論與社會關懷理論。

一個人如果從小就實際或感受到生活在父母、老師、友儕、社區、國家、社會，乃至整個世界、宇宙都關切著他的環境裡，他一定遵循著正向的軌範而成長，焉會掉入犯罪深淵而無以自拔？包括物質、社會、心理、精神，乃至靈性的需求統攝為所謂的「社會支持」。請各位仔細觀察一下社會周遭熟悉的犯罪人，乃至死刑犯，難道他們都是天生的「壞胚子」？一出生就注定要成為那個犯罪人？死刑犯的一生行為難道都是惡貫滿盈的胡作非為？聰明如各位，各位一定可以想到或找到數以千百計的負面、有缺陷的社會支持，一直在滋養他們，或排擠他們身陷生命深淵絕境，不是嗎？

不單是人，連靈長類的動物，天生就具有社會關懷的本性，以此「人性本善」為中心的儒家思想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。什麼是「社會關懷」？它是引導(Lead)我們會思量(Consideration)他人的利益遠超過自身利益的傾向組合體(Set)，我們人類往往具有關懷他人福利、親近特定人的欲求、遵從道德直覺

，以及順從他人看法與行為等的心理傾向，此一社會關懷會隨人類個體之性

別、年齡、布施對象、心力強弱、己獲益、匿名等而有不同之社會關懷力度， 這是存在於人們內心天生即有的本錢，它可以大力協助犯錯的人步上常軌而不再犯罪。

含括Cullen（2008）的社會支持理論與Agnew（2013）的社會關懷理論等

兩大整合型的理論的正向犯罪學（positive criminology），這兩位西方資深犯罪學者的主張，不但符合我們中華文化核心，同時把這個正向犯罪學介紹給關心我們社會的所有成員，我相信透由直接教養（Fostering），或透過專業人員教導父母、教師等道德信念與提升同理/同情之能力，以傳承社會關懷至下一代； 我們未來在形成實務政策時，期待能在控制犯罪人「惡」（‘bad’）之外，尤應兼顧開發（cultivating)其「善」 （‘good’）的部份，極力找出可有效抑制犯罪之社會關懷因子，其中更應積極參與符合我們東方中華文化的修復式司法（ restorative justice）計畫，藉以涵育我們對待犯罪人的同理心，達成安祥和樂的生活環境之後，不待我們強求，忤逆我們犯罪矯正工作的順勢自然到來！